

1931

9月小

18

星期五

辛未年 農曆

■ 崔海波 著

JIU-YIBA SHIBIAN QIJIAN
ZHONGGUO、RIBEN YU GUOLIAN DE JIAOSHE

九一八事变期间 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师大社科合字[2013]第 002 号《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和国联的关系研究》研究成果

本书获长春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 日本与国联的交涉

崔海波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 / 崔海波

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 4

ISBN 978 - 7 - 5677 - 6432 - 3

I. ①九… II. ①崔… III. ①中日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31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082 号

书 名: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

作 者: 崔海波 著

责任编辑:王瑞金 责任校对:王瑞金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1.75 字数:213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6432 - 3

封面设计:林雪

吉林市海阔工贸有限公司印刷

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4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 - 895800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尽管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 80 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也早已散尽，但是正视和反思历史问题，汲取历史教训，对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历史进行总结，阐释抗日战争的历史根源仍是很有意义的。自日本战败以来，有些日本学者就一直竭力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宣扬九一八事变仅仅属于偶发事件，是日本关东军个别军官违抗上级命令所挑起的事端，并非是日本政府的国策。

崔海波博士此书中披露的细节和相关阐释足够驳斥这种观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地段的铁路，然后进攻中国军营北大营，继而在第二天就占领了整个沈阳城。这确是日本关东军少数军官的行为，但随后日本军部、日本内阁和日本外务省却以此为契机逐渐改变犹豫态度支持关东军扩大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就不再是关东军少数军官的军事行动，而是日本国家的侵略行为。如书中所述，尽管 1931 年 9 月 19 日日本政府确立不扩大方针，但 9 月 21 日驻朝鲜日军第 39 旅团未经许可就越境擅自进入中国东北支援日本关东军，而且这次的行动从未得到日本内阁、日本军部尤其是日本天皇的许可，是一次明显的擅自行动，从根本上违反了日本政府的不扩大方针。日本军部和日本内阁非但不追究其违法责任，相反很快就予以承认，在 22 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内阁决定对这支部队给与拨付经费支持。

实际上，日本政府通过九一八事变追认关东军的侵略行动，一步步扩大了侵略战争，进而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了整个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对此逐渐进行调整和适应。日本军部和日本关东军所谋划的扩大侵略策略不断排挤日本内阁和外务省的对外策略，最终日本军部和日本关东军在事变后扩大侵略策略在日本政治系统内获得主导权，并使之成为日本国家的对外策略。随之，日本内阁由最初的犹豫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其中日本外务省及其驻外机构积极为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力图避免国际社会的干涉成为事变后日本外交的目标所在。可见，九一八并不只是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动，九一八事变实质是日

本各个政治系统都充分参与的，是日本国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行为。因此，当前某些日本学者、右翼的政客想以日本关东军中极个别参谋的肆意妄为来掩盖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国家侵略性质是完全说不通的，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在歪曲历史，也是在为侵略战争进行辩护和开脱。

崔海波博士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中国、日本和国联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此问题学界一直很少触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为了维护战后秩序和世界和平，协约国和参战各国达成了一致，成立了国联。然而就“一战”后国联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国联建立后很少关注中国事务，事关中国的国际争端，国联大多选择置身事外，而不是发挥积极作用。确切地说，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并没有在东亚扩大影响力和发挥实际作用，尤其是在面对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体制在调处中日冲突中并没有发挥影响力，东亚地区事务尤其是“一战”后激烈变动中的中日关系一直都是国联发挥作用的盲点。

从本书可知，面对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国政治系统内部各派系和各实权人物尽管都试图将关注重点集中于筹划抗日上，但最终反而导致各派系和各实权人物间不但没有走向协调反而加剧了内争的局面，甚至频频出现以筹划抗日为手段以期达到在党、政、军各种权力领域实现重新分配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治系统内部无法在更高程度上开展协调和动员，在积极抵抗和消极应对中不断徘徊，而积极抵抗所需高度整合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而中国政治系统在内争不已的国内局势下采取了军事上不予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和依赖国联调处，这种最消极的危机应对策略。日本和中国在各自内政系统调整中所形成的事变应对态势奠定了各自与国联交涉的基础。

随后以国联为平台，日本、中国和国联三者之间展开进一步交涉。在整个过程中，国联最初在角色选择上避免了采取独立行动直接介入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为处于危机中的中日两国划定行为边界以赢得中日两国对于国联的支持，但国联为中日两国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并没有被日方所接受和遵守，然后国联以企图重申或者新设定边界的方式约束日本的行为，并没有惩罚以及遏制措施跟进的应对方法。国联的消极应对方式，对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采取通过的连续军事侵占造成既定事实，然后强迫中国和国联接受的策略没有什么约束效力。国联要求日本撤兵的协议一再被日本拒绝而归于失败。尽管国联迟迟派出的调查团最终掌握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和性质并提出解决中日冲突的建议，但此时日本已经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实质占领，国联已经失去了阻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最佳时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发布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呈献给世人，使得日

本对于国联交涉所采用的欺骗策略无以为继，最终日本退出国联，国联也没有能力通过经济和军事制裁的方式使日本遵守国联决议，导致国联也失去了调处中日冲突的最后时机。因此，在最后阶段，国联调处中日冲突仍告失败。

反思那段历史，中国在事变后采取了单纯依赖国联的应对策略，在与国联的交涉中，中国向国联提出的解决建议和措施一再遭到国联的拒绝，从而丧失了事变最初阶段遏制关东军扩大军事行动的机会，在已经感知到国联的调处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仍被动地依赖国联调处，最终付出惨痛代价。所以，今天的我们要从历史中学习，以史为鉴，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对于我们来说，为了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研究和反思是极为重要的。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来之不易。那是任凭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应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却的民族血泪史、抗争史，同时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朵。因此，作为作者的老师，我非常期待本书能为思考历史认知问题的读者带来帮助。是为序。

陈景彦

2016年清明节前夕

目 录

第1章 绪 论	(1)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5)
第2章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体制及其对日本中国的影响	(9)
2.1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	(9)
2.1.1 一战期间欧美关于成立国联的构想	(9)
2.1.2 巴黎和会与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	(13)
2.1.3 国联对一战后国际争端的应对	(18)
2.2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中国与国联的关系	(22)
2.2.1 日本与国联的合作及其局限	(22)
2.2.2 中国与国联的政治和技术合作	(27)
2.2.3 国联对中日争端的应对	(29)
2.3 小结	(32)
第3章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的应对策略	(34)
3.1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局的变动	(34)
3.1.1 从币原外交到田中外交	(34)
3.1.2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对侵占中国东北的准备	(38)
3.2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内部的协调	(43)
3.2.1 不扩大方针名存实亡	(43)
3.2.2 事变后日本的应对策略	(50)
3.3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外交应对	(58)
3.3.1 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59)
3.3.2 事变后币原外交及其实质	(64)
3.4 小结	(70)
第4章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内争与应对策略	(72)
4.1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冲突	(72)
4.1.1 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冲突	(72)

4.1.2 “攘外必先安内”与国民党的“剿共”	(78)
4.2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	(81)
4.2.1 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	(81)
4.2.2 外交上拒绝中日直接交涉与依赖国联调处	(91)
4.2.3 对民众自发抵抗的态度	(96)
4.3 小结	(102)
第5章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中日冲突	(103)
5.1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启动	(103)
5.1.1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角色的选择	(103)
5.1.2 国联要求日本撤兵决议的失败	(113)
5.2 李顿调查团报告的发布与日本退出国联	(131)
5.2.1 李顿调查团对中日冲突的调查	(131)
5.2.2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中日两国对报告书的反应	(140)
5.2.3 日本退出国联与国联调处的无果而终	(147)
5.3 小结	(149)
结 语	(150)
参考文献	(153)
大事年表	(173)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3月1日日本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迅速改变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乃至一战后的国际格局。日本再一次以侵略战争的方式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明治维新后，军国主义成为日本对外尤其是对华战略的主要选项，甲午战争就是具体表现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再一次重复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华战略，并终结了一战后币原外交所标榜的与中国合作与国际协调的外交战略。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进入准战争和战争状态，这种状态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得以终结。

九一八事变还具有改变一战后国际格局的重要意义。九一八事变爆发所处的国际背景与一战前的中日战争冲突所处的国际背景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战前战争作为一种解决国际争端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一再被使用，很少出现反对声，在整个国际政治结构中也没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等因素来反对战争。以往战争爆发后，一般在英法美俄等大国的斡旋下争端双方通过直接谈判解决，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的。

但欧洲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战这一国际政治悲剧之后，不论是国际舆论，还是在国际政治进程中发挥举足轻重影响力的英法美等国，都开始反省并在将反对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上达成广泛的理性共识。随后在巴黎和会上建立国联作为调处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的专门国际组织，而在凯洛格非战公约中更是明确提出反对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因此，在国际舆论反对战争并有国联这一制度和程序力量防止战争的国际背景下，使得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以往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化特征。九一八事变的国际化特征主要体现在日本、中国与国联围绕该事变的解决而展开的三方交涉。因此，日本、中国与国联的交涉是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与国联的交涉集中了日本和中国的主要注意力。比如,日本政府在追认关东军和朝鲜军出兵合法化后并没有着手准备从国内派兵,事实上侵占中国东北主要是由日本关东军完成的。而南京国民政府在整个事变期间大体在军事上奉行不抵抗主义。因此,九一八事变并没有像以往中日战争那样呈现出在军事领域激烈对抗的特征,换言之,事变爆发后中日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对抗展开非常不充分。另外,日本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日中直接交涉解决,这也是以往中日冲突发生后的惯用解决方式,但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就此次冲突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导致此次中日冲突没有呈现出以往中日直接在外交领域交涉解决的特征。相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将此次中日冲突诉诸国联并被国联受理以后,国联开始依托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来调处此次中日冲突,中日两国政府也将注意力集中于与国联的交涉上。对中方而言,中国主动将本应承受与日本军事和外交对抗的压力通过诉诸国联的方式转向国联。对日本而言,在中国这种应对策略下,日本被迫地将原本应与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直接对抗转向与国联交涉中。

由此可知,日本、中国与国联的交涉成为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中国与国联的交涉对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和性质的界定以及事变期间的演变趋向乃至解决事变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对作为发动战争的一方日本、遭遇侵略的一方中国及处于调处一方的国联间所展开的交涉进行研究,呈现日本、中国和国联各自的交涉策略以及作用局限,对于深入了解和认识九一八事变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中国与国联的关系,除一般报道和评论外,史学界对本课题进行了相关研究,也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以下将从几个方面来介绍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时期方面来看,中国学者对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向国联申诉,以及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日本和国联展开研究,并大多集中在针对当时事态的评论和分析方面。其次是建国后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在研究内容上多揭露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并着力于批判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奉行的不抵抗主义,完全否定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向国联申诉的方式来抑制日本侵略的外交策略,认为国联与日本勾结不可能为中国主持公道,根本不应该向国联提出申诉。最后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开始注意到日本与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矛盾之处,尤其是试图通过新的研究视角重新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依赖国联调处的外交策略。

比如,赵东辉在《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一文中不仅基本肯定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是合理的,而且还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国联展开外交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宗成康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一文中进一步肯定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的历史意义,认为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政策绝不是偶然,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且开展这种外交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彭敦文在《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政策,是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一直以来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洪岚在《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将事变诉诸国联不论是作为对日斗争的一种外交手段,还是从国内局势来看,都是一种必要的外交措施。近年来,围绕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中日冲突,国联如何发挥作用调处中日冲突等问题,国内学界的努力值得关注,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理清,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都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对于中国与国联关系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处的过程和历史评价方面,对于国联从建立开始其体制存在缺欠的认识和国联对中日争端调处过程中,中国的应对方面,尚缺乏关注。另外,大多数学者是通过分析《国际联盟调查报告》即李顿调查报告来认识中国、日本与国联当时所处于的国际关系。相关论文有窦爱芝《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真相》(《历史教学》1998年第12期),李淑娟《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处活动评析》(《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王启华《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金光耀和朱利《〈李顿文件〉所见之李顿中国之行》(《复旦学报》2003年第4期),谷小水《“独立”社与国联调查团》(《福建论坛》2004年第6期),洪岚《李顿调查团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得失》(《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对李顿调查团的研究多集中于该团在华期间的调查活动,李顿等人对中日争端的基本态度,对报告内容的评析以及国人对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中形成的调查报告的反应等问题,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行论证,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对国联为何如此调处九一八事变,认识不够全面并缺乏深入探讨,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并结合主导国联的英法等大国的国情作深入分析。

从台湾学者的研究角度方面来看,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实施不抵抗政策和向国联申诉等问题,台湾学者一直以来倾向于为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作辩护。比如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纂:《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1986年版)一文中充分肯定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的必要性。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对事变时期的国联外交持完全否定态度,如蒋永敬在《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专著中对九一八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向国联申诉的外交政策是完全错误。在台湾学者的研究中梁敬鎔的专著《九一八事变史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的《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和李云汉编写的《九一八事变史料》,涵盖了国民政府应对事变的多种档案文件、电文和会议记录,这些都成为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重要基础。

从国外学者对本课题的研究状况方面来看,日本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与国联外交策略方面,比如榛原茂树和柏正彦的《満州事变外交史》,其中运用了大量日本与国联、中国、美国、英国等交往的公文来分析国联的调处。另外,由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写的《日中戦争から日英米戦争へ》一书从日方角度出发清楚地介绍了事变的始末。关于日本处理满洲事变相关应对方面,臼井勝美的《満州事变 戦争と外交と》、海野芳郎的《国際連盟と日本》、中村菊男的《満州事变》、緒方貞子の《満州事变と政策形成の過程》等成为研究本课题的重要基础。此外,还有事件实际参与者的回忆录,如幣原喜重郎的《外交五十年》和芳澤謙吉的《外交六十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英美学者关于国联研究的著作也很多,在相关本课题方面的研究中比较著名的是W. W. Willoughby(韦罗贝)的《The Sino-Japanese controversy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中日纠纷与国联》),其详细地分析了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中日争端的经过,详细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外交的意义和作用。另外,Edward Bing-Shuey Lee在《One Year of the Japan-China undeclared War》(《日一中未宣之战的一年》)中收集了中日两国与国联往来的重要文件,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Sandra Wilson在《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Japanese Society, 1931—1933》(《满洲危机与日本社会, 1931—1933年》)一书中除了对九一八事变进行研究外,还指出事变后满洲的危机是促使日本发动二战的一个直接原因。总之,无论是日本学者还是英美学者大多集中于阐明九一八事变的原委及后果,但对国联调处中日争端失败的原因尚未有深入分析,因此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篇论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避免部分学者充分肯定国联在处理

中日争端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而对国联本身从成立伊始就存在的问题忽视或分析不深入,或部分学者过于强调国际联盟由于本身的局限性而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处理中日争端等问题。一些英美学者忽略国联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对中日争端调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不足,和日本学者不重视缺少美苏参加的国际联盟,以及国内学者只是单方面研究发动战争一方或国际联盟调解一方,而未将二者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总之,关于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冲突的调解,到目前为止,学界的态度大多是负面评价,认为国联袒护日本,李顿调查报告完全牺牲中国利益,实质上是主要列强大国在华“利益均沾”的方案。因此,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客观地分析、认识本课题。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本文以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三者的交涉为研究对象。九一八事变具有以往中日冲突中所不具备的特征。首先,在九一八事变中日的冲突中,没有呈现出像甲午战争中日双方在军事和政治等领域直接对抗的特征。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虽然一方面在军事上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积极扶植傀儡政权,并最终建立日本一手控制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中国方面几乎坐视日本对东北侵占步骤的展开而没有进行系统、直接、有力的抵抗。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双方主要在外交交涉领域进行接触和对抗。

其次,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并没有像以往中日冲突发生后中日之间通过直接外交交涉,以一方或者双方作出妥协和让步的方式予以解决,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双方的交涉主要在国联这个平台上进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方曾经在小范围内试探由中日直接交涉解决,但马上被中国方面所拒绝,随后日本方面一再提出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解决此次中日冲突,但中国方面不为之所动。外交上,中国将此次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诉诸国联,要求国联依据巴黎和会所建立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给予解决,国联因此介入此次中日冲突。这样,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启动和调处此次中日冲突,使此次中日冲突具有了更强的国际性特征,导致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双方的交涉主要在国联这个平台上展开。

最后,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的交涉,表面上主要体现为以国联为平台,三方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程序下通过公开辩论等形式进行交涉。国联在以往解决国际冲突的时候也是以自身为平台通过争端双方的公开辩论等形式进行交涉解决。但国联在以往调处国际冲突时由于独立能力不足无法掌控调处冲突的节奏,致使其调处流于形式而饱受诟病。国联对此

次中日冲突的调处也是一样，国联没有发挥其独立调处控制冲突的能力，国联尤其需要日本和中国给予配合。这就导致国联调处效能的发挥，反而取决于日本和中国在事变后的应对策略如何，如果有一方不予配合，将导致国联的决议无法施行。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的交涉尽管受到国联和平机制和相关技术程序的引导，但实际上国联和平机制和相关技术程序所能达到的效能反而取决于日本和中国所确定的应对九一八事变的策略如何。这是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交涉的关键所在。

因此，探讨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的交涉就要首先探讨事变发生后日本和中国所确定的应对策略。此次事变期间日本和中国应对策略的确定都呈现出一种外交受制于国内政治的现象。日本和中国各自的外交部门在各自国家应对策略的确定过程中影响力不大，相反日本和中国各自内政系统的其他子部分就应确定何种策略纷纷发挥影响力。对日本而言，事变发生后在政治系统内部日本军部和日本关东军所谋划的对外策略不断排挤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对外策略，最终日本军部和日本关东军在事变后应对策略的确定上获得主导权，日本政治系统接受日本军部和日本关东军所谋划的最积极的应对策略，并以此确定日本国家的对外策略。而中国围绕危机中的应对策略在政治系统内部协调中极其困难。面对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国国民党高层就对日政策产生纷争，导致各派系和各实权人物间不但没有走向协调反而加剧了内争的局面，甚至频频出现以筹划抗日为手段以期望达到在党、政、军各种权力领域实现重新分配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民党高层内部无法在更高程度上开展协调和动员，在积极抵抗和消极应对中不断徘徊，但积极抵抗所需高度整合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因而中国政治系统在内争不已的国内局势下采取了军事上不予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和依赖国联调处，这种最消极的危机应对策略。日本和中国在各自内政系统调整中所形成的事变应对战略奠定了各自与国联交涉的基础。

基于以上对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中国和国联交涉所呈现特征的认识，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述。

在第二章中主要阐述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的各种构想基础上，为了维护战后和平建立了国联。但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还是一个有待完善的机制，使其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就一战后国联与日本的关系而言，日本与国联的合作中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日本通过攫取利权扩大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模式。在涉及日本切身利益的时候，日本也没有改变其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这与国联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并不相符。随后日本与国联合作的时候其局限性也日渐

凸现出来,尤其是在涉及到日本利益的时候日本对国联的态度渐渐趋于保守。就一战后国联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国联建立后很少关注中国事务,尤其是事关中国的国际争端,国联大多选择置身事外,而不是发挥积极作用。国联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国联机构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方面,在涉及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国联充满了无力感。也就是说,国联及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并没有在东亚扩大影响力和发挥实际作用,尤其在面对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体制在调处中日冲突中并没有发挥影响力,东亚地区事务尤其是一战后激烈变动中的中日关系一直都是国联发挥作用的盲点所在。

第三章主要论述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治系统内部通过协调所确定的应对策略。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政局变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币原外交在国内政治影响力减弱,与此同时主张强硬外交的田中外交却日渐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其中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已经着手谋划侵占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部政治系统开始进行调整和适应,最终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以军事侵占和政治上扶植傀儡政权的解决策略在日本政治系统内被接受。随后,日本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由最初的犹豫转变为积极配合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外务省及其驻外机构积极为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并且力图避免国际社会的干涉成为事变后日本外交的目标所在。日本政治系统所确定的应对策略是日本与国联交涉的基础。

第四章主要论述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确定危机应对策略。由于当时中国政局混乱、国民党内争不断、各方面政治力量对事变所持态度不一,对于是否进行军事准备抵抗日本侵略缺乏决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国民党高层的内争局面,在应对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上中国的政治力量最终没有形成抗日的合力。中国政治系统整合的低效,尤其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导致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和外交领域筹划的时候采取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而非主动和系统的抵抗计划。在军事领域采取不抵抗方针,即使是为了配合外交交涉的军事抵抗准备也无从谈起。在外交领域上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解决,担心因此而签订城下之盟,坚持通过诉诸国联的迂回外交策略。事实上,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给中国政治系统所造成的压力通过诉诸国联的方式传导给国联,消极依赖国联给予调处。

第五章主要论述在日本政治系统内部日渐支持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而南京国民政府无法在军事上给予直接抵抗,在外交上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而主张诉诸国联并依赖国联给予解决的情况下,国联开始介入并调处此次中日冲突,随后以国联为平台,日本、中国和国联三者之间进行交涉。在这个过程中,国联最初在角色选择的过程中避免了采取独立行动直接介入的方式,

而是希望通过为处于危机中的中日两国划定行为边界以期望赢得中日两国对于国联的支持。但国联为中日两国所设定的行为边界并没有被日方所接受和遵守，要求日本撤兵的协议一再被日本拒绝而归于失败。随后国联派出调查团开始掌握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和性质并提出解决中日冲突的建议，但此时日本已经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国联已经失去了阻止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最佳时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布后，日本退出国联，国联也没有能力通过经济和军事制裁的方式使日本遵守国联决议，导致国联也失去了调处中日冲突的最后时机。

第2章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体制及其对日本中国的影响

一战期间,欧美相关政治力量在建立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上,达成共识并进行相关的筹划。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借鉴一战期间关于国联的各种构想,通过国联建立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但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际政治的结构,加之国联在自身设计上存在很多漏洞,使得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在应对一战后国际争端中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对于东亚国际关系而言,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并没有使国联在东亚国际关系演变尤其是在一战后的中日争端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战后日本、中国和国联在东亚国际关系上并没有建立起稳定和有效的合作关系。

2.1 国联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机制的建立

2.1.1 一战期间欧美关于成立国联的构想

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主要依据主权独立原则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根据主权独立至上原则,国家是判断自身行动的唯一和最高裁判,因此为了追求国家利益发动战争的行为往往被视为国家的自由。并且,“如果没有一个特殊条约明文规定不得对另一国作战,或者规定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诉诸战争,任何国家就都可以根据任何理由对任何其他国家进行战争而不违反国际法。”^①也就是说,在近代国际政治准则中,战争并不被国际法所禁止。民族国家基于主权独立原则发动战争,加之国际法对于国家战争权的默认,使近代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在处理国际争端中,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再诉诸战争。战争行为成为近代国家处理外交问题的一个必备选项,有的时候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首要选项。通过战争决出胜利方和战败方再以协约的形式解决国际争端恢复和平。为了应付各个国家都要面临的战争风险,各个国家基于势

^① 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